



美国司法部美国司法部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

雅各布-K-贾维茨联邦大楼

联邦广场 26 号, 37 层

纽约州纽约市 10278

2024 年 6 月 2 日

通过电子文件系统 (ECF)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

美国地区法官

纽约南区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美国法院大楼

珍珠街 500 号

纽约州纽约市 10007-1312

回复: 美国诉郭文贵, 案号 S3 23 Cr. 118 (AT)

尊敬的托雷斯法官:

政府谨致函反对被告对法院排除托马斯·毕晓普的专家证词以及限制雷蒙德·德拉贡和保罗·多兰的专家证词的命令提出的重新考虑动议。见文件第 364 号 (“重新考虑动议”); 文件第 338 号 (“最终达伯特命令”); 另见文件第 305 号 (“第一次达伯特命令”)。

正如本法院已裁定的, 寻求重新考虑这一 “非常救济” 的动议并不是 “重新审理旧问题的工具”。*美国诉郭案*, 第 23 Cr. 118 号 (AT), 2024 WL 1250985, 第*2 页 (纽约南区法院, 2024 年 3 月 22 日) (引用*美国诉 Baldeo案*, 第 13 Cr. 125 号, 2015 WL 252414, 第*1 页 (纽约南区法院, 2015 年 1 月 20 日))。虽然当事人被禁止利用重新考虑 “再尝试一次”, *美国诉 Lisi案*, 第 15 Cr. 457 号, 2020 WL 1331955, 第*2 页 (纽约南区法院, 2020 年 3 月 23 日), 但这里被告在提交了两轮专家披露并收到了法院的两个命令之后, 第三次尝试获得不同的裁决。4 月 24 日, 法院在第一次达伯特命令中发现被告的初步专家披露 “即使在最近对规则 16 进行修订之前, 细节程度也不够。” 文件第 305 号, 第 3 页。法院允许被告再次尝试, 见同上, 第 5-6 页, 被告在 4 月 29 日提交了四份修订后的专家披露。在当事人就被告的第二轮专家披露提交了大量简报之后, 见文件第 322 号, 第 328 号, 法院发布了一份 19 页的命令, 部分批准和部分拒绝了政府排除或限制被告拟议专家证词的动议。见最终达伯特命令。

在没有任何法律变更和没有引用新事实的情况下，被告只能通过将法院允许三位拟议辩护专家作证的命令描述为“明显错误”和“显然不公正”来寻求重新考虑。见重新考虑动议，第 1、3、16、17、18 页；另见郭案，2024 WL 1250985，第*2 页（解释重新考虑“只有在以下情况下适当授予：(1) 法律适用的临时变化；(2) 新证据的出现；或(3) 需要纠正明显错误或防止明显的不公正”（引用美国诉 Goldberg 案，第 12 Cr. 864 号，2021 WL 2444548，第*1 页（纽约南区法院，2021 年 6 月 15 日））。最终达伯特命令审查了大量记录并详细解释了法院在审判中履行其“最终‘把关角色’”设定专家证词边界的依据。最终达伯特命令，第 2 页（引用 Daubert 诉 Merrill Dow Pharms., Inc. 案，509 U.S. 579, 597 (1993)）。没有理由重新考虑法院在此问题上的两个先前命令，被告的动议应被拒绝。

I. 程序历史

4 月 1 日，当事双方相互交换了专家披露文件。郭通知拟作证的专家包括雷蒙德·德拉贡（关于 GTV 的估值）、玛吉·斯科拉（关于加密货币）、托马斯·毕晓普（关于资金流动问题）和保罗·多兰（关于中国政府针对海外反对者的努力）。4 月 9 日，政府提出动议，要求排除这些证人，理由包括郭的通知不充分。文件第 272 号。法院同意这些通知不充分。其 4 月 24 日的命令发现郭的通知提供的细节水平“即使在规则 16 最近修订之前也是不足的。”文件第 305 号（第一次达伯特命令）第 3 页。法院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允许郭补充其披露，以使其符合规则 16，并“为法院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根据达伯特要求进行‘严格审查’。”同上，第 5 页（已清理）。

郭在 4 月 29 日提交了第二组披露文件。5 月 3 日，政府补充了其反对意见，并动议完全排除托马斯·毕晓普和雷蒙德·德拉贡的证词，并排除或替代性地限制玛吉·斯科拉和保罗·多兰的证词。文件第 322 号。5 月 6 日，被告对政府的补充达伯特动议作出回应，提交了近二十页的简报，为补充后的德拉贡和多兰的披露辩护。文件第 328 号（“被告 5 月 6 日简报”）第 3-13, 27-34 页。5 月 17 日，法院发布了最终达伯特命令，部分批准和部分驳回了政府要求的救济。最终达伯特命令驳回了政府排除或限制斯科拉证词的动议，同上第 9 页，¹部分批准和部分驳回了政府限制多兰证词的动议，同上第 11 页，部分批准和部分驳回了政府排除或限制德拉贡证词的动议，同上第 16 页，并批准了政府排除毕晓普全部证词的动议，同上第 13 页。

¹ 法院裁定，政府可以在斯科拉证词结束时请求一项限制性指示，“向陪审团澄清‘符合或遵守行业标准或法规并不意味着被告没有犯罪意图’。”最终达伯特命令第 11 页，脚注 7（引用政府备忘录第 19-20 页）。

在法院下达最终达伯特命令之后且在审判开始之前，当事双方进行了广泛的善意谈判，并就中国政府的针对性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辩护律师理解，在谈判这一协议时，政府是希望简化与针对性有关的证据。此外，政府在这些谈判中合理地依赖于最终达伯特命令对多兰证词范围的限制，多兰是被告主要的关于针对性问题的证人。在当事双方的长时间谈判期间，辩方从未表示将寻求重新考虑法院的命令，以扩大多兰证词的范围。双方的协议由辩护律师于 5 月 29 日宣读入证，就在同一天，被告随后提出动议，内容包括要求法庭重新考虑对多兰证词的最终裁决。

被告的动议要求重新考虑法院排除德拉贡关于“收入和市场方法”的证词的命令，最终达伯特命令第 17 页，以及排除“多兰证词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偏离太远，可能使陪审团陷入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同上第 12 页。重新考虑动议第 1 页。

II. 法律标准

在刑事案件中提出重新考虑动议，当事人必须“简明扼要地陈述律师认为法院忽略的事项或有控制性的决定”。纽约南区地方刑事规则 49.1(d)。重新考虑的规则“应严格解释和适用，以避免在法院已经充分考虑的问题上重复辩论”。*Dietrich 诉 Bauer* 案，198 F.R.D. 397, 399 (纽约南区法院 2001) (解释与之实质相似的地方民事规则 6.3)；另见，例如，*美国 诉 Sosa* 案，第 14 Cr. 468 号 (AT)，2022 WL 1690833，第*2 页 (纽约南区法院，2022 年 5 月 26 日) (“在决定刑事案件中的重新考虑动议时，本巡回法院的法院依据与民事案件中适用的原则相同的原则解决此类动议” (内部引用省略))。

“重新考虑法院先前命令是一种非常救济，应谨慎使用，以利于案件的终结和节约稀缺的司法资源。”*Baldeo* 案，第 13 Cr. 125 号 (PAC)，2015 WL 252414，第*1 页 (纽约南区法院，2015 年 1 月 20 日)，经上诉确认，615 F. App' x 26 (第二巡回法院 2015) (内部引号和引用省略)。“批准此类动议的标准是严格的，除非动议方能指出法院忽略的控制性决定或数据——换句话说，这些事项可能合理地预期会改变法院的结论，否则重新考虑通常会被拒绝。”*美国 诉 Goldberg* 案，第 12 Cr. 864 号 (LAP)，2021 WL 2444548，第*1 页 (纽约南区法院，2021 年 6 月 15 日) (引用省略)。

在寻求重新考虑时，当事人既不能“重新审理旧问题”，*Baldeo* 案，2015 WL 252414，第*1 页，也不能“提出以前未向法院提出的新事实、问题或论点”，*Nat' l Union Fire Ins. Co. of Pittsburgh 诉 Stroh Cos., Inc.* 案，265 F.3d 97, 115 (第二巡回法院 2001)。

III. 论点

A. 没有理由重新考虑法院对德拉贡证词的合理限制

在给予被告两次机会披露德拉贡的估值意见范围后，法院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德拉贡的拟议证词“不可靠”。最终达伯特命令第 16 页。法院发现德拉贡仅“广泛提及了三种不同的估值方法”。同上。只有一种方法——倒推法，被以任何细节进行了描述——尽管是由郭的律师在 2023 年 12 月 15 日的简报中描述的——这种方法在德拉贡的首次披露中缺失，仅在他的第二次披露中简要提及”。同上。法院随后考虑了德拉贡纠正披露中添加的证物和图表，发现它们“没有包含任何信息，说明德拉贡是如何利用这些输入，通过收入法或市场法对 GTV 进行估值的”。同上第 17 页。由于被告的两次披露缺乏“任何关于德拉贡的方法论或结论”的描述，法院最终裁定“德拉贡不得就收入法或市场法作证”，也不得对 A&M 报告的“有效性”发表意见，这份报告是由缺席的不可交叉询问的非证人应 GTV 律师的要求在 2020 年编写的，使用了不同 G 企业 (GNews) 数据。同上。²

被告的重新考虑动议仅对旧论点进行了新的阐述，同时批评法院“忽略”了在被告 5 月 6 日对政府补充达伯特动议的回应中详尽提出的论点。见重新考虑动议，第 3-14 页；对比，例如，被告 5 月 6 日简报第 12-13 页（强调“德拉贡先生进一步采取了独立评估 A&M 报告数据和假设的步骤”）与重新考虑动议第 1 页（“如 2024 年 4 月 29 日德拉贡先生的补充披露中所述，并在郭先生的反对意见（文件第 328 号）中解释，德拉贡先生进行了多次独立分析，以评估 GTV 的价值”）。重新考虑动议随后声称，“法院以德拉贡未能进行自己的分析为由排除其证词构成错误。”重新考虑动议第 3 页（添加了强调）。法院并未裁定德拉贡的分析独立性不足，而是裁定其解释不充分：最终达伯特命令排除了他对其三种声称的方法中的两种方法的拟议证词，因为他的两次披露“未包含任何关于德拉贡如何使用这些输入来使用收入法或市场法对 GTV 进行估值的信息”。最终达伯特命令第 17 页。

正如政府在考虑被告的第二组专家披露时所主张的——并且法院同意——“被告不应再次被允许补充德拉贡先生的披露，这已是第三次尝试公平地向法院和政府提供通知。”文件第 322 号，第 10 页。法院并未“误解”被告先前两次提交的德拉贡证词，

² 最终达伯特命令还排除了德拉贡关于“A&M 报告有效性”的证词，同上第 18 页，以及“关于中共审查对公司价值的任何定量‘影响’”的证词，同上（引用文件第 328 号，第 9 页），并排除了他关于 SPACs 的拟议证词，同上。被告的动议并未寻求重新考虑这些裁决。

重新考虑动议第 5 页，法院对其充分性进行了适当评估，并发布了两项命令，最终允许德拉贡就其两次签名披露中合理解释的单一估值方法作证。该裁决完全在法院的达伯特把关职责的范围内，没有理由重新考虑。

B. 没有理由重新考虑法院对多兰证词的合理限制

在处理被告第二次提交的多兰的专家披露时，政府并未寻求完全排除多兰的证词。事实上，政府明确指出了多兰拟议证词中那些“与法院多次先前命令一致”的部分。见文件第 332 号，第 21 页。然而，政府确实试图排除多兰提出的意见中的某些部分，这些部分是不相关的、比证明价值更具偏见或混淆行，或者是在多兰的知识或专长之外不允许重复的传闻证据。见同上，第 22 页。

法院的最终达伯特命令发现“多兰的部分证词偏离太远，可能使陪审团陷入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引用规则 401 到 403，并排除了关于“五毒”、“非法中国警察局”、中国招募当地国民作为“影响力代理人”的证词，以及与本案无关的外国政府的行为。同上，第 12 页。法院还援引权威资料，排除了“多兰就司法部对于针对郭的人提出的指控所提议的证词”，因为“多兰没有提出关于猎狐行动与郭的关系的任何意见，而是复述了司法部起诉文件中的陈述，而没有对此应用专业知识”。同上，第 13 页。然而，法院允许多兰提供一系列关于中共针对行为的意见。

对这一结果不满意的是——在背景是最终达伯特命令的谈判下，进入证据的协议已经谈成，且在有些谈判过程中没有任何通知政府将提出重新考虑动议的情况下——被告将法院的审前裁决描述为“明显错误”。³见重新考虑动议第 16 页。法院最终达伯特命令的所谓致命法律缺陷在于它“排除了政府甚至未请求排除的多兰证词”。同上，第 17 页；另见同上，第 18 页（指出最终达伯特命令的另一个部分是“显然不公正的”，因为“政府没有寻求排除”相关证词）。

法院的裁决--部分否决了政府的救济--并没有错误，更不用说“明显错误”达到被告提交中暗示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程度。首先，最终达伯特命令并没有超出政府请求的范围。⁴实际上，法院驳回了政府的一些请求，允许两部分证词，这些证词政府认为是不

³ 确实，该协议包含了关于与猎狐行动相关的郭的针对性信息。

⁴ 举个例子，被告通过仔细分析政府补充反对意见的措辞，主张政府并未寻求排除多兰关于“秘密、非法中国警察局”的拟议证词。重新考虑动议，第 17 页（引用文件第 332 号，政府补充反对意见，第 23 页）。但政府的简报明确将该主题包括在“无关但详细的偏离”列表中，见同上，并完全将其排除在前一部分中识别的多兰拟议证词范围之外，见同上，第 22 页。

可接受地依赖于传闻证据。见最终达伯特命令第 13 页（允许关于“联邦调查局局长对猎狐行动的评论”和“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美国针对中国警察和情报人员进行猎狐行动的操作”的证词）。即使法院的决定超出了政府的排除请求——如上所述，其实并没有超出——法院不必将其裁决局限于政府要求的救济。实际上，法院甚至可以“自行主动提出达伯特问题”以履行其“特别义务”来监管专家证词的边界。*ROMAG Fasteners, Inc. 诉 Fossil, Inc.* 案，第 10 Cv. 1827 号 (JBA)，2014 WL 1246554，第 *2 页（康涅狄格州地区法院，2014 年 3 月 24 日）。

法院对多兰意见的限制，仅在法院给予被告第二次机会争取更广泛的证词之后实施，完全在其“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内履行这一把关职能”，关于 *Pfizer Inc. Secs. Litig.* 案，819 F.3d 642, 658（第二巡回法院 2016），不应在审判期间第三次重新考虑。⁵

谨此提交，

达米安·威廉姆斯
美国联邦检察官

通过： /s/ _____

麦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尔
贾斯汀·霍顿
朱利安娜·N·穆雷
助理美国检察官
(212) 637-2190 / 6612 / 2276 / 2314

⁵ 最终达伯特命令排除了托马斯·毕晓普的全部拟议专家证词。见同上，第 13-15 页。在一个脚注中，被告声称他“仍打算以专家身份召毕晓普作证”以讨论喜马拉雅交易所——据称是因为“政府并未寻求排除”毕晓普这一部分的证词。重新考虑动议，第 1 页 n.1。事实并非如此。政府“动议排除毕晓普的证词”，全部排除，法院完全批准了该动议。见最终达伯特命令，第 15 页。被告可能可以召毕晓普“作为总结证人，总结已经作为证据的某些银行记录”，重新考虑动议，第 1 页 n.1，但他不得以专家身份作证或提供意见。根据法院的裁决和适用法律，法院应严格限制毕晓普的非专家证词，防止偏见性的意见发表，这些是法律不允许的。见例如，*美国 诉 Blakstad* 案，第 21-2859 号，2023 WL 2668477，第 *2-3 页（第二巡回法院，2023 年 3 月 29 日）（总结令）（解释总结财务证人，与专家不同，必须不行使“任何自由裁量权”，并且“仅应用”提供方选择的方法，而不“支持”该方法）。